

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关键词】 美国宗教、美国外交、美国大选

【摘要】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已呈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在海外倡导所谓宗教自由、或推行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已成为自越南战争后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外政策上的“两党一致”破局以来新的外交政策“意见一致”。

【中图分类号】 D928.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2009)2 期 0033—06

【完稿日期】 2009年1月28日

近30年以来，由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复兴和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宗教在美国内政外交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宗教对美国政治的这种显性影响的标志性事件，在外交政策上是“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通过；在国内政治上则是2004年美国大选。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人权立法之一，该法案的通过和实施均较充分地体现了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2004年美国大选为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右翼的政治动员提供了舞台，“价值观选民”和“400万白人福音派选民重回投票站”，被认为是共和党获胜的关键因素。

然而，“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通过至今已有10年，不仅国际上对该法案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美国国内以及不少法案的当事人对法案实施的得失、尤其是对该法案是否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也有不少检讨和争论。在2008年美国大选，民主党一举重获总统职位以及对国会参、众两院的

控制权，所谓宗教差距，即经常上教堂的选民更倾向于投共和党的票以及共和党得到更多宗教选民的支持大大缩小，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右翼的政治能量也受到质疑。^[1]

一、宗教在当前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若干趋势

尽管对海外宗教问题的关注一直是美国政府和大众的偏好，但美国传统外交并不特别强调宗教。除个例外，上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所强调的是支持宗教自由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直接和单边的干预行动。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当时尤其是冷战时期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外交考量所致；同时，宗教团体议程过于广泛，缺乏目标、共识、专业知识和游说力量，在政策问题上往往持先知式不妥协的道德立场，也是重要原因。^[2]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的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

和伊斯兰教)复兴、美国国内宗教右翼势力的崛起并与政治右翼合流、“9·11”事件后国际关系中宗教因素的凸显,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的非地缘政治化,均增加了宗教在美国国际战略考量中的地位,在全球推进所谓宗教自由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问题上呈现出以下或隐或显的七个趋势。

立法化(或国会化)趋势:主要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他主要由宗教团体推动的立法倡议,如“2002年苏丹和平法”、“贩运受害者保护法”、“2003年朝鲜自由法”、“2004年朝鲜人权法”等,其中“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建立了宗教因素直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全新框架。从20世纪初以来的美国外交史来看,宗教因素的作用最突出地体现在1911年美国国会因犹太人问题废除俄美商约、1973年美国国会针对苏联犹太人问题通过的“杰克逊—瓦尼克法”以及国会通过上述“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等三大事件上,在此三大事件中国会在代表宗教利益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方面都起了主导作用。

机构化趋势: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规定设立的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跨党派半官方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总统特别助理,以及涉及所谓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政府和国会机构,如国会与行政部门对华委员会等;建立了在全球范围报告宗教自由问题和认定所谓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以及有选择制裁等机制。对所谓宗教自由的关注已开始渗入美国传统外交建制的文化。

国际化趋势:指以美国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或国际“人权联合体”的形成。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是由关于宗教人权的各种国际和地区性的公约/条约、各种旨在促进所谓宗教人权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各国(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国际宗教和人权政策等组成的庞大国际机制和网络。目前美国在所谓宗教自由问题上对中国便采取了结合单边、双边和多边施压手段的“多管齐下”的态势。

草根化趋势:指以争取所谓宗教自由为宗旨的

新人权运动的广泛群众基础。与主要倡导所谓政治权利的老人权运动或传统人权建制不同,新人权运动是草根运动,背后是所谓宗教美国(其中基督教福音派便号称有5000至8000万信徒),政治动员走国会路线;而老人权运动则主要是精英运动,政治游说基本上走传统外交路线。“新人权运动”具有极强的基层动员能力,对此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普特南评价说,美国“宗教保守派创建了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最大和组织最好的草根社会运动”。^[3]

联合或联盟化趋势:指美国宗教组织在宗教自由议题上结成有不同团体参与的各种全国性或跨国性的盘根错节的所谓倡议者网络,共享人员、资源、机构和信息,以造成更大声势对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施加压力。如近年来致力于反对所谓苏丹政府宗教迫害的“达尔富尔运动”的核心组织之一“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就曾拥有180多个成员组织,其中包括美国最大的一些宗教组织,这些成员组织遍及美国的社区教会网络,为该运动提供了民间政治动员的巨大资源,而其广泛的跨国联系又为该运动的国际活动提供了渠道。目前美国关于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问题的立法,主要就是由这些宗教联合组织或立法联盟所推动的。如倡议“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宗教右翼团体,就利用该议题在美国高度的敏感性广泛结盟,“将自由派犹太教团体与保守派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与西藏佛教徒、圣公会教徒与救世军结为一体”,^[4]成功地将其外交政策议题“主流化”,从而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媒体化趋势:指宗教人权运动不走传统外交路线,除动员基层外,其惯用的运作方式就是诉诸媒体,尤其是诉诸进入“门槛”较低的网络媒体,这使其在获取各种信息、影响政治议程和信众政治选择方面具有更多的途径和更强的能力,而所谓宗教自由议题本身也具有极大的媒体效应。这些均使所谓宗教自由问题溢出传统外交渠道,缩小了传统外交建制的运作空间,从而使宗教问题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更具对抗性。

安全化趋势:主要指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

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或是某种“硬性”的地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鼓吹“宗教自由即促进国家安全”的“宗教自由和平论”,把在全球推进所谓宗教自由与“反恐怖主义”和“反宗教极端主义”结合起来,实际上已将宗教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等量齐观。如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托马斯·F. 法尔在 2008 年 3/4 月的《外交》双月刊上就再次呼吁美国外交应使“保护和扩展宗教自由成为其核心因素之一”,并宣称“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议题是伊斯兰恐怖主义”。^[5] 目前在美国,宗教自由问题已与人权问题脱钩而成为独立的外交政策议题,而倡导所谓宗教自由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圈子的标准话语。

目前美国朝野对宗教问题在其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中的地位看法渐趋一致,关注国际宗教自由似已成为自越战以来在对外政策上的“两党一致”破局以来新的外交政策“意见一致”;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昔日“传教士外交”以及当今“人权外交”的最新版本。“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解释。^[6] 就美国而言,“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可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社会政策化(即关注公共或社会政策议题)与反映宗教团体和信徒大规模介入外交领域特征的所谓国民外交的某种结合。而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上述趋势,便具有“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的鲜明特征。

二、宗教在 2008 年美国大选中的作用

2004 年大选共和党大获全胜,作为支持共和党的最强有力选举集团之一的基督教福音派似乎已经见到了其政治抱负上的“应许之地”,保守福音派领袖如“爱家”的詹姆斯·C. 多布森等在共和党内得到“总统制造者”的礼遇,有政治分析家甚至认为基督教福音派与共和党的联盟可使共和党在美国政治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但在 2006 年美国

中期选举中,布什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在 2004 年大选中利用宗教选民呼风唤雨的政治魔力不再灵验。在 2008 年大选中,民主党不仅在几乎所有具有不同信仰程度的选民群体中,^[7] 而且在几乎所有宗教团体中的得票率均较 2004 年大选有所提高,使两党选战中的“宗教差距”明显缩小(见下表)。

2000 年至 2008 年大选民主、共和两党得票率 (根据宗教归属)

	2000 年 (%)	2004 年 (%)	2008 年 (%)	民主党得票率: 2004 - 2008 年
	戈尔 布什	克里 布什	奥巴马 麦凯恩	
得票率	48	48	53	+5
	48	51	46	
新教徒	42	40	45	+5
	56	59	54	
白人新教徒	35	32	34	+2
	63	67	65	
福音/重生派	/	21	26	+5
	/	79	73	
非福音派	/	44	44	0
	/	56	55	
天主教徒	50	47	54	+7
	47	52	45	
白人天主教徒	45	43	47	+4
	52	56	52	
犹太教徒	79	74	78	+4
	19	25	21	
其他信仰	62	74	73	-1
	28	23	22	
无教会归属	61	67	75	+8
	30	31	23	

资料来源:2000, 2004, 2008 National Exit Polls, <http://pewforum.org/does> (Nov. 12, 2008).

两次选举的巨大落差使得人们不禁要问,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能量是否已开始下降? 美国的宗教保守派是否已经过气,其政治势力由盛转衰的拐点是否已经出现? 这些问题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考虑:一是 2004 年以来美国政局的变动,宗教已不再成为政治选战的重大议题;二是基督教福音派内部开始出现不同声音甚至左倾趋势,其与共和党的长期政治联盟出现松动和裂痕;三是民主党开始“拥抱宗教”,“讲宗教”不再是共和党的专利。

首先,宗教在 2004 年美国大选中作用突出,因此该选举年有“价值观选民年”之称。但由于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沼,2007 年夏又爆发次贷危机并由此引发自上世纪 2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

济危机,传统经济和社会问题超过伊拉克战争而成为总统选举年的头号问题。在2004年大选中宗教保守派的三大议题——反对同性婚姻、堕胎和干细胞研究——对其政治动员已不再有效,2008年成为“经济年”或“金融风暴年”。就大选议题而言,大选前后各种民调表明,美国选民认为经济、能源与油价、医疗保健、反恐、伊拉克战争等依次为2008年大选最重要的议题,其中经济被所有宗教团体中列为头号议题;与此同时,美国一般选民把堕胎和同性婚姻列为2008年大选最不重要的问题,连白人福音派也未把此两个问题列为他们最关注的五大议题之一。经济社会问题的彰显以及伊拉克战争的困局大大压缩了共和党和宗教保守派运作所谓道德问题的政治空间。

第二,宗教保守派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向左转以及福音派——共和党联盟的松动既有短期,也有中、长期的原因。就短期原因而言,共和党的道德和贪腐丑闻、布什政府在推进福音派议程上行言不一,福音派感到被利用和受欺骗,以致使长期以来被视为共和党基本盘的基督教福音派在2006年中期选举和2008年大选投票日“守斋”。如卡尔·罗夫就认为,有超过400万每周去教堂不止一次并在2004年大选中投票的福音派人士在2008年未去投票站。^[6]伊拉克战争也是导致福音派不满的重大原因,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重要杂志《今日基督教》甚至还提出基督教福音派是否应为他们迅速支持入侵伊拉克一事“忏悔”的问题。^[9]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经历了自卡特总统以来在政治上的第二次幻灭。

就中、长期原因而言,基督教福音派在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觉醒”,至今活跃于美国政治舞台已达30年之久。30年前把基督教福音派带入共和党并实现其政治右转的老一代福音派领袖不是已经作古,就是已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基督教福音派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已全面展开。新一代的福音派领导人拒绝旧的政治标签,刻意与共和党保持距离,开始使“福音派世界”摆向温和或中间立场。基督教福音派领导层的内部分歧也反映了该派社会地位的变化。在过去的30年中,被认为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基督教福音派的教育、收入、社会地位和都市

化或市郊化程度有明显提高,社会意识增强,他们虽仍支持福音派传统议题,但保守福音派领袖年复一年、每周必弹的反“堕胎”、“反同性婚姻”等所谓文化战争老调已不再能引起他们最大的兴趣。他们开始关注所谓中产阶级议题,政治议程有所扩大,涉及反战、环境保护、移民、全球贫困等社会问题,出现“绿色环保基督教”等新福音主义思潮。事实上,全球变暖等问题已成为引起福音派领导层内部严重分裂的问题。2008年5月7日,80多位温和福音派宗教领袖在华盛顿签署的《福音派宣言》中,宣称基督徒应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否则福音派信仰将失去独立性而沦为政党的工具。^[10]但一些基督教保守派领袖看不到或不能适应福音派社会基础的变化,仍将福音派与共和党捆绑在一起,结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福音派群众,尤其是失去更愿意成为独立选民并更倾向于支持奥巴马的福音派青年的支持,使福音派的内部分歧不仅以领导层内部、而且以领导层与基层信徒分歧以及新老福音派之间“代沟”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保守福音派领袖重蹈多年前基督教自由派的覆辙,成为“渐失士兵的将军”。

第三,民主党“拥抱宗教”,争取福音派选票,也是福音派与共和党的政治联盟出现松动的一个重要原因。2004年大选民主党在宗教问题上再度严重失分,克里身为天主教徒却不能获得多数天主教选民的支持。民主党领导层痛定思痛,达成共识不再把“道德大旗”拱手让与共和党,改变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放弃白人教会的做法,从基层党组织到全国机构开展了该党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教拉票行动。民主党“拥抱宗教”被媒体和政治评论家渲染为“民主党宗教大觉醒”和“新道德多数派”的崛起,宗教左翼/进步派的政治复兴是2008年大选在宗教领域的主要特点。

与此同时,民主党也在积极修复它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多年来民主党及其候选人均因堕胎问题疏远天主教徒,而本次大选前后民主党领袖谋求在移民、最低工资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与天主教会结盟,而天主教会越来越直言不讳地反对伊拉克战争,

也加速了此种修复过程。2008年大选民主党在天主教徒中的支持率从4年前比共和党少5个百分点到反超7个百分点,再次表明天主教徒是美国政治中最大和最典型的摇摆选民团体。而把重点从动员基本盘转向争取摇摆和独立选民尤其是天主教选民,被证明是本次大选民主党成功的选战策略之一。

三、宗教对大选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

美国国内外政局的变化,基督教福音派内部的分化以及民主党的“宗教觉醒”,使一度似牢不可破的共和党与保守福音派联盟之间出现裂痕,以致该党推不出可同时被经济保守派和社会保守派、福音派草根信众和上层领袖接受的像当年小布什那样的理想候选人。《纽约时代杂志》早在2007年发表署名文章,认为基督教福音派“没有合适的总统候选人,没有团结的领导层,并且看来甚至不再拥有共同的政治信念,”因此福音派在美国政治中已“日暮途穷”。^[11]

因美国正面临严重经济危机,2008年大选在宗教上是“小年”,宗教议题不可能像4年前一样成为引起社会分裂的楔子问题。不过目前尚未有充分证据表明福音派在政治上已经“过气”,2008年大选也不一定就是对保守福音派权力建制的“公信力测试”,选民不按所属宗派而按信仰程度进行投票的趋势在未来仍将继续,事实上民主党“拥抱宗教”恰好是基督教福音派力量的显示:正是基督教福音派持续30年的政治影响力把某种程度上的宗教测验加之于当今美国的总统选举。基督教福音派摆脱与共和党联盟的羁绊,反而使其获得更多政治上讨价还价的能力,为其与包括民主党在内的其他势力就各种福音派议题组建新的联盟创造了条件,并因此有可能对美国社会产生更加广泛深入的影响。

就两党宗教差距而言,尽管2008年民主党的宗教拉票行动取得成功,尤其在争取天主教选票方面,但宗教差距依然存在:首先,民主党在本次大选提高了在白人新教徒和基督教福音派中的得票率,但整个格局依然是“红肥蓝瘦”,共和党在这

两个选民团体中仍拥有巨大优势;其次,宗教议题在本次大选中的重要性降低,但仍出现在不少州的选票上。在本次大选中,加州、佛罗里达和亚里桑那三州通过公民投票禁止同性婚姻,使美国禁止同性婚姻的州达到29个,而禁止同性婚姻是近年来宗教保守派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第三,民主党的“宗教觉醒”或“宗教皈依”也有相当大的局限:一方面宗教保守派并不买账,^[12]而且民主党长期以来排斥宗教的“负面”形象根深蒂固,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另一方面2006年中期选举民主党翻盘和本次大选获胜,依靠的主要是宗教自由派和通常不上教堂的选民,这使党内权力建制中的不少人对本党讨好福音派选民的做法和新近的宗教关注持怀疑态度。

与两党宗教差距有关的是所谓文化战争问题。鉴于本次大选社会道德问题重要性下降,有论者认为美国社会宗教左右两翼之间的“文化战争”已经偃旗息鼓。对此可作以下分析:首先,美国宗教格局不是简单的左右双峰对峙,红蓝两大阵营的对立并没有文化战争论者所形容的那么严重,故被称为“文化口水战”。^[13]虽然“文化战争”可能对美国宗教左右两翼各10%至15%的选民而言确实存在,但绝大多数宗教选民是中间派,无论在神学还是在政治上均呈现极强的多元性,有学者就将美国宗教选民按神学观点和政治倾向的差异划分为12个不同的部落;^[14]其次,对文化战争也有界定问题,如把文化战争界定为文化/经济大众主义与文化/经济精英主义之争,或容他性的政治文化与排他性的政治文化之争,那么文化战争论对当前美国的政治文化依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不过在这里大众主义和精英主义也有交叉:被认为代表经济精英主义的共和党标榜代表文化大众主义,而标榜经济大众主义的民主党则被认为代表文化精英主义;第三,奥巴马作为黑人竞选及当选总统,本身就可被视为某种文化战争问题,反映了美国社会文化的重大变化。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堕胎、同性婚姻等宗教价值观问题才取代“肯定性行动”等种族问题成为所谓文化战争的首要问题。总之,2008年大选美国在文化和宗教领域尽管并非硝烟弥漫,但也远

不是风平浪静。

对共和党而言，自里根政府以来共和党的政治基础或所谓里根联盟被比喻为三条腿——即支持强大国防、低税收、保守宗教和社会价值观的三股势力——的板凳。2008年大选表明此三条凳腿开始摇晃，党内此三股力量并未形成合力。在本次大选失利后共和党要想翻盘，在政治上就要做加法，除重回其政治基础外，还需争取“关键投票团体”如青年选民和拉美裔美国人等的支持。然而本次大选政治上最大的输家之一是美国南部，民主党无需像过去那样实施迁就该地区保守势力的“南部战略”照样能赢得大选。过去数十年来共和党的“南部化”以及南部在美国政治上的边缘化，缩小了同样以南部为重心的共和党和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活动空间，使共和党与基督教福音派一样，也面临着在不过分倚重对方的情况下重组和扩大其政治联盟的难题。

目前，宗教势力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尽管受到各种传统因素的制约，如美国外交建制的现实主义传统、亲企业的共和党传统以及宗教团体内部纷争的传统等，但它已成为平衡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公司利益和战略考量的重要力量，并且使对所谓宗教自由的关注成为美国全球政治的一个核心目标。就对华政策而言，目前美国朝野已形成两个比较明显的共识或意见一致：一是推进所谓海外宗教自由，在目前美国宗教的基本面以及宗教影响美国外交的现行机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会减少个人色彩但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民主党的“讲宗教”和在中期选举及本次大选的获胜，加强了目前国会已经形成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宗教人权联合体，加上奥巴马当选后府院并轨，这将使中国在宗教人权和经贸问题上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双重压力，其中经贸问题将更为突出，这一点与其内部有足够强大的企业利益来平衡其宗教利益的共和党政府会有所不同；二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当前国际地位、把中美关系视为当前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两党共识以及此种共识的日益机制化，尽管此种中美关系两党共识通常采取在野与在朝前后不一、前

倨后恭的方式。就上述两种共识而言，在一般情况下后者即中美关系两党共识对前者即所谓宗教自由两党共识形成牵制，使之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搅局而非决定性因素；但在特殊情况下，宗教团体通过诉诸被美国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并结成广泛的政治联盟，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美关系的现状并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某些方面产生有效和实质性的影响。宗教问题在中美两国均具有高度敏感性。从1949年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两国关系缓和以来宗教问题就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15]就目前而言宗教问题仍是中美关系的“温度计”，对两国关系的走向具有指针性作用。

注 释：

[1] 可参徐以群：《宗教与当前美国政治》，载徐以群等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政府组织》（第5辑），时事出版社2008年，第512-520页。

[2] 徐以群：《宗教与美国外交政策》，载《和平与发展》（2008年第1期），第62-66页。

[3] 引自 Alle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pp.30,34.

[4] Allen D. Hertzke, "The Faith Factor in Foreign Policy: Religious Constituents and Congressional Initiative on Human Rights," in *Extensions* (Spring 2001), p.16.

[5] Thomas F. Farr, "Diplomacy in an Age of Faith, Religious Freedom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8), pp.111,112. 另参 Thomas F. Farr, *World of Faith and Freedom: Why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Liberty Is Vital to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可参徐以群：《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载上引《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政府组织》，第494-495页。

[7] 根据选后民调，每周一次或多次参加宗教崇拜的选民中有43%支持奥巴马，比4年前支持克里的39%增加4个百分点；每月或每年数次参加宗教崇拜的选民中有57%支持奥巴马，比4年前支持克里的53%增加4个百分点；从不参加宗教崇拜的选民中有67%支持奥巴马，比4年前支持克里的62%增加5个百分点。资料来源：2000, 2004, 2008 National Exit Polls, <http://pewforum.org/does> (Nov. 12, 2008).

[8] Karl Rove, "A Way Out of the Wilderness," in *Newsweek* (Nov. 24, 2008), p.31.

[9] 引自 David D. Kirkpatrick, "The Evangelical Crackup,"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 28, 2007), p.43.

[10] *An Evangelical Manifesto: The Washington Declaration of Evangelical Identity and Public Commitment*, May 7, 2008, Washington D. C., <http://www.anevangelicalmanifesto.com>.

[11] 前引 *Newsweek* (Nov. 24, 2008)封面。

[12] 如詹姆斯·C.多布森就指责奥巴马“故意曲解”（下转第44页）

的默许和支持下,以色列最近对加沙地带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进攻,杀死杀伤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其中多数是无辜平民。这激起了阿拉伯和伊斯兰民众对美国的新仇恨。其中不少人赶赴阿富汗参加塔利班抗击美军。这是塔利班得以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四,美国的“反恐谋霸”政策有碍国际反恐合作。美国打阿战不只是为了消灭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也是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将军事触角伸进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战略需要。美国不仅企图通过阿战取得有利于遏制它所谓的“潜在对手”的地缘战略优势,而且对反恐盟友巴基斯坦,也肆意越界进入其境内追击恐怖分子,粗暴侵犯其主权。美国这种以霸权目的和手段反恐的做法,很难取得阿周边有关国家的认同和有效配合,最终不利于其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反恐战争。

在客观上,美军对手塔利班尽管人数和装备与美军及其盟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但是一个信仰坚定、斗志昂扬、士气高涨的武装集团,有一定的实力和较大的能量,很难对付。塔利班战士土生土长,熟悉当地地形,又以抵抗外敌相号召,得到相当多数阿富汗人的支持。他们利用这种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在全国开展“打了就跑”的游击战,神出鬼没,进退自如,能以少胜多。驻阿联军对此防不胜防,很难找到准确的打击目标,且其现代化武器在布满高山深谷的阿富汗难以发挥效用,要在场典型的不对称战争中大获全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塔利班不是孤军奋战,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激进势力怀着对美国的深仇大恨坚定地站在塔利班一边,不断对其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使塔利班能够坚持长期抗战。

上述表明,美国虽占据战场优势,但要消灭塔

利班却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同时,塔利班也更不可能实现赶走外敌、恢复政权的目标。阿富汗战争再打下去,不可能有赢家。阿富汗问题只有通过和平谈判和实现全国和解来解决。由于双方所提和谈条件完全相左,和平前景曙光未现。阿富汗战争还将拖延下去。

注 释:

- [1] Helmand at Wa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Insurgency in Southern Afghanistan and Its Effects on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The Senlis Council Report, June 2006. P17.
- [2] 陈一鸣:《阿富汗袭击事件频频发生》,《人民日报》,2006年2月6日第3版。
- [3] Harvey Thompson, "Afghanistan under occupation: An assessment—Part 2",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7/feb2007/afgh-f15.shtml>.
- [4] 郑瑞祥:《阿富汗的和平与重建任重道远》,《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5期,第13页。
- [5] "Afghan death toll soars to 8,000 last year",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8/mar/11/afghanistan.unitednations>.
- [6] 同注释[3]。
- [7] "塔利班再烧外国部队‘粮草’",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2/09/content_10475441.htm.
- [8] "U.S. death toll in Afghanistan was 1 last month",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ld/iraq/complete/la-fg-afghan2-2008dec02,0,7488508.story>.
- [9] "报告称塔利班恐重新控制阿富汗 活跃于美使馆区",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2/10/content_10480401.htm.
- [10] 辛本健:《美国国防战略的调整》,《人民日报》,2008年8月5日第3版。
- [11] 徐步青、孟祥麟、李学江、章念生:《面对阿富汗:各有各的顾虑》,《人民日报》,2008年2月5日第3版。
- [12] James Cogan, "Afghanistan: Growing talk of a political deal with the Taliban",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8/oct2008/afgh-o15.shtml>.
- [13] "Gates says thousands more troops will be sent",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ld/iraq/complete/la-fg-briefs12-2008dec12,0,7923092.story>.
- [14] 王南:《战和两难的尴尬》,《人民日报》,2008年10月16日第3版。

(上接第38页)对《圣经》的传统解释以适合他自己的世界观及其混乱的神学”。引自 Lisa Miller and Richard Wolfe, "Finding His Faith," in Newsweek (July 21, 2008), p.19.

[13] Leo P. Ribuffo, "Afterword: Culture Shouting Matches and the Academic Study of American Religious History," in Bruce Kuklick and D. G. Hart, eds., *Religious Advocacy and American History*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7), p.221.

[14] 分别为宗教右翼、腹地文化斗士、温和福音派、新教主流派

核心、天主教可争取派、宗教左翼、信仰但不归属派、世俗派、拉美裔、犹太人、穆斯林及其他信仰、黑人新教徒等。见 John Green, Dan Gilgoff and Steven Waldman, "The Twelve Tribes of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2008 Election," <http://beliefnet.com/News/Politics> (Oct. 30, 2008).

[15] 可参 Dong Wang, "Portraying Chinese Christianity: The American Press and U.S.—China Relations since the 1920s," 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 13 (2008), pp.81—119.

PRECIS

Brief Analysis of Climat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limat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ilateral all-round strategic cooperation. Since this year, the cooperation has achieved great development, but there still exists restrictive factors. To expand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s in the important interests of China and ASEAN.

Religion's Impact on Current America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Since 1990s, especially since September 11, religion has presented a tendency of leg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civilianization, combination, medialization, securelization, etc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To advocate "freedom of religion" or carry out "faith-based diplomacy" has become new "consensus" of the Republicans and the Democrats since consensus of the two parties in foreign policy ended after Vietnam War.

Origin of Somali Pirate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Recently, the piracy off Somalia's coast is very rampant and harmful. The United Nations passed many resolutions to call for international action against Somali pirates. Only in both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measures can the scourge be eliminated gradually.

Several Judgments of Current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In 2008, the financial crisis, energy crisis and food crisis hang over the world economy. In particular, the financial crisis to spread ou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around the world and from virtual economy to real economy interrupts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world economy.

专题文章

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人权外交^①

涂怡超^②

【内容提要】 二战结束后，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福音派发展迅猛，信徒人数和组织数目均大幅增长。美国是世界福音派的中心，美国福音派在世界福音派中居领导地位。近30年来，福音派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持续上升，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的重要力量。同时，美国福音派的跨国政治参与亦主要依赖美国这一主权国家的制度空间。宗教人权是基督教福音派跨国政治参与的首要目标，在此主导下，基督教福音派对美国人权外交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人权外交制度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关键词】 福音派，政治参与，宗教自由，人权外交

① 本研究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外交”、复旦大学“金苗”项目“基督教与美国对华政策”中期成果。

② 涂怡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博士。

20世纪以来,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根据福音派自己的统计,美国现有福音派约9000万人。^①而根据巴纳抽样统计,2006年美国的福音派人数约2695万人。^②尽管两类统计相差甚多,但美国福音派的兴旺发达却不可否认。如今,基督教福音派已占据了美国社会文化的主流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福音派的崛起及其“政治觉醒”成为美国宗教和政治舞台上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③它们以信仰为体、以组织为用,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福音派主要以人权、尤其是宗教人权为议题,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本文分四部分剖析基督教福音派对美国人权外交的影响:第一部分意在追溯福音派高倡宗教人权之缘由;第二部分回顾福音派力求将观念嵌入美国外交机制的努力;第三部分厘清福音派与美国外交中的人权导向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概述福音派与美国对华宗教及人权外交;最后为结语。

一、福音派为何倡导宗教人权

基督教向以“让全球听神的声音”为己任,汲汲于海外传教事业的发展。当代福音派海外传教的宗旨则延续近代以来新教的海外传教传统,力求

^① Patrick Johnstone and Jason Mandryk, eds., *Operation World: 21st Century Edition* (Waynesboro: Paternoster Lifestyle, 2000), p. 658.

^② 美国权威统计机构 The Barna Groups 对福音派人数的调查不是简单地询问是否是福音派,而是通过信仰细分调查来界定,因此具有较大可信度。其调查的标准是:重生;相信信仰在他们今日生活中非常重要;相信自己有责任与非基督徒分享信仰;相信撒旦存在;相信唯凭恩典,才能获得永恒拯救,而不是借事工;相信耶稣在地无罪;圣经正确无误;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完美神祇,神创造世界,并仍然统治世界。从这一标准可以看到,这一调查对福音派的界定非常严格。巴纳抽样调查结论,是2006年全美9%人口为福音派。而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人口统计结果为299,398,484人。本文中数据由此得出。参巴纳网站资料:<http://www.barna.org/FlexPage.aspx?Page=Topic&TopicID=17> (March 1, 2007); 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资料:http://factfinder.census.gov/servlet/SAFFPopulation?_event=&geo_id=01000US&_geoContext=01000US&_street=&_county=&_cityTown=&_state=&_zip=&_lang=en&_sse=on&ActiveGeoDiv=&_useEV=&pctx=fph&pgal=010&_submenuId=population_0&ds_name=null&_ci_nbr=null&qr_name=null®=null&3Anull&_keyword=&_industry= (March 1, 2007)。

^③ 徐以骅:《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载于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一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人权外交

将福音传遍“地极”。

殖民时期，基督教海外传教发展迅猛，在众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诸多传教特权。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在19世纪的拉美、非洲和亚洲即已风起云涌。自“一战”结束以来，多个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更是蓬勃发展，成为影响20世纪世界政治的一个关键因素。基督教传教运动催生了各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却又在一些原本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民族主义者眼中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工具，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成为民族主义的重要对立面。^①“传教士，回家去！”（Missionary, go home）成为令传教士们惊心动魄又委屈万分的口号。^②二战结束之后，共产主义者获得了多个国家的政权，亚非拉民族国家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③由于近代对亚非拉的传教与西方殖民侵略如影随形，传教士在这些新兴国家往往被视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而遭受排斥。失去殖民强权庇护的传教事业陷入风雨飘摇。^④

在此情况下，基督教首先必须在求生存的基础上谋发展，宗教自由成为基督教赖以在各种不同形式政权下生存的基石。因此，为了达到全地归主的目的，宗教自由是保障其接触世界各国未得之民的首要目标，从而成为传教运动的基石；其次，劝人改宗需要证明基督宗教的优越性，这一优越性既体现在教义上，也体现在社会正义上。在此基础上，传教运动必然致力于教会所肯定的“公共的善”，并力争成为其视野中公共理性和实质性价值的推动者、体现者。

① 教内学者梁家麟曾分析19世纪中国频繁的教案冲突，认为“事实上，传教士某些不当的措施和行为，也是促成教案爆发的主动者”，原因有三，在归还教会财产过程中的处理不当；某些天主教传教士滥用教廷与中国官阶品位的对照，举止逾礼；以及传教士干涉司法判决等。再加上地方官员由于怕洋人而偏袒教民，就逼得平民百姓只好上梁山了。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书楼1988年版，第111—114页。

② James Scherer, *Missionary, Go Hom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4) .

③ 各国民族主义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的时间有较大参差。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非洲才进入独立高潮。

④ 据统计，到1980年，世界上有25个国家禁止外国传教士入境传教，24国实行部分关闭，约18个国家采取不同程度的严厉措施限制传教士的渗透，总计为67国，涉及31亿居民。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

就美国福音派而言，这种推动受到内部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多重制约。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老线教会的传教士大批从一些亚非拉国家撤出，而美国福音派的国际网络尚在建立阶段。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种族歧视这个结构性矛盾尚在解决之中，而美国白人福音派在民权运动中所起的作用相对有限，当时的美国被众多国家视作和南非类似推行种族歧视恶政的国家，并不具备道德优势，反而有着侵犯人权的阿喀琉斯之踵。并且当时东西方冷战正炽，已进入到苏攻美守阶段。

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重心已发生从传统差会向福音差会的转移，70年代以来，各类福音派差会已提供美国新教海外传教事业65%以上的资金和85%以上的人力，完全控制了传教事业的主导权。^①权威海外传教史专家保罗·佩尔森（Paul E. Pierson）认为一战以来海外传教出现了重大转变，当时10,800名来自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中的80%由历史上的传统教会赞助。到1996年，那些同样的老线教会仅征召了2,600名传教士奔赴海外，而海外传教士的总数是43,600人。^②2005年，海外传教士总数则达44,384人。用于海外事工的资金则达5,241,632,384美元。^③福音派成为今日传教领域的主导。其中派遣海外传教士最多的是美南浸信会，该会2007年海外传教士总数为4009名。^④目前美国福音派传教士遍布全球，仅朝鲜、伊朗、科威特等少数国家和地区成为例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福音派通过柏林会议和洛桑会议等国际性福音派大会完成了福音派国际网络的建设，并获得了对这一

① 徐以骅：《美国新教海外传教史述评》，载于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一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② Paul E. Pierson, "The Rise of Christian Mission and Belief Agencies," In Elliot Abrams, ed.,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and U.S. Foreign Polic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pp. 156—157.

③ 人数包括驻扎4年以上的长期传教士33,714名，1—4年的中期传教士7,615名及3,055名获全额资助的无住所海外传教士。但不包括1年以内的短期传教士。Linda J. Weber and Dotsey Welliver, *Mission Handbook: U.S. and Canadian Protestant Ministries Overseas 2007—2009* (20th Edition) (Wheaton: EMIS, 2007), p. 13. 这一数字尚不全面，一些传教组织出于各种考虑，未提供其海外传教士人数及事工图。

④ 同时该会年派往海外的短期传教士为30,000人。Linda J. Weber and Dotsey Welliver., *Mission Handbook: U.S. and Canadian Protestant Ministries Overseas 2007—2009* (20th Edition), p. 297.

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人权外交

体系的主导权。这些福音派的传教、救援和发展组织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直接与福音右翼的政治活动相关，但为福音右翼提供了遍布世界的信息来源。

民权运动则最终推动美国在法理上解决种族歧视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转而提倡人权外交，以所谓正义诉求推动世界演变。

随着福音派海外传教事业的大幅扩展和福音派国际网络的日趋成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原本对其他国家的宗教及人权状况关注甚少的福音派由是将人权议题作为其政治参与的重要议题。福音派首先将关系到福音派核心道德问题的堕胎、节育问题与美国的国际人口政策和对外援助挂钩。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National Right-to-Life Committee）等福音右翼组织和美国生活联盟（American Life League）等天主教组织结盟，游说政府取消对强制人民进行节育和堕胎的政府的相应外援，^①也曾参与过《1974年贸易法》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倡议。但当时福音派右翼在政治参与方面处于起步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是天主教团体以及犹太人团体。过去的三十余年，天主教和福音派均就这一议题影响美国外援政策的走向。^②

人权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宗教人权，美国的人权外交也就成为福音派政治参与的重要方面。冷战结束后，福音派一度以为有关宗教人权的话题已告一段落，在政治参与方面重点放在国内生命和家庭议题。随着美国福音派传教活动在前共产党国家及其他众多国家的扩张，同时在以尼娜·谢娅（Nina Shea）^③和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④为代表的人权分子和人权

^① Jane W. Muthumbi, *Religious A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ristian and Islamic Fundamentalist Anti-Abortion Network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Ph. D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5, pp. 101—102.

^② 关于这一议题对美国外交政策数十年来的影响，参看刘琼：《美国天主教会与“亲生命运动”》，载于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三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390—393页。

^③ 天主教徒，自由派民主党人，人权律师出身，曾任人权组织“自由之屋”的“争取宗教自由中心”主任，现任哈德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2003年7月至今一直担任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之职。

^④ 正统派犹太人，人权律师，在推进国际人权倡议方面极具影响和组织能力，目前担任多项社会职务，包括哈德森研究所国际宗教自由项目主任。

组织的游说下，反对宗教迫害自 1996 年来成为保守且极具传教热忱的基督教福音派右翼的主要外交政策议题。^① 这一议题激起了众多福音派信徒的共鸣。根据 2000 年的调查，有 41% 的福音派领导人和 16% 的福音派普通信徒赞成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社会问题。3/4 强的福音派领导人在调查中表示，他们坚定地赞成，与宗教迫害进行战斗应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②

福音派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对如何解决问题，主要可分三个派别。一部分福音派教徒支持福音派著名领导人葛培理 (Billy Graham) 的思路，重视和各国及各地政府建立友好联系，首要问题是拓宽传教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徐图以进；一部分福音派教徒对政府有天然的怀疑，漠视主权国家政府及政府间国际组织解决人权问题的能力和努力，通过自己的草根行动来完成对国外基督徒的救助；还有很多福音派教徒相信自己的政府，相信美国的体制是现有人类社会中最好的体制，相信通过政府的人道主义干涉可以更快地解决国外的人权及宗教问题，而世界和美国的政治气候也给了他们进行游说的空间和动力，他们成为将宗教自由嵌入美国外交机制的主力。

二、多方游说，将观念嵌入机制

目前福音派积极嵌入社会各界、扩展和巩固倡议网络，从而加大其影响外交政策的力度和有效性。他们主要透过以下四种具体途径推动人权及反宗教迫害的机制化努力。

1. 精英游说

福音派领导人像葛培理一样，通过与政府首脑的私人关系开展精英游说。

① Allen D. Hertzke,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Crusade against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Elliott Abrams, ed.,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 U. S. Foreign Polic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pp. 79—85.

② John C. Green, "Civic Engagement Overview," In Michael Cromartie, ed., *A Public Faith*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p. 15.

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人权外交

查尔斯·科尔森 (Charles Colson) 和葛福临 (Franklin Graham)^①均利用自己与小布什总统的私人关系, 向其大力游说苏丹问题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以期通过布什总统向国务院等外交机构施压。同时, 福音派利用与白宫众多新保守主义者的私人关系和已形成的共识, 通过局内人策略进一步加大游说力度。

表 1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著名美国福音右翼政治倡议领导人简表

姓名	组织
查尔斯·科尔森 (Charles Colson)	监狱团契
理查德·兰德 (Richard Land) ^②	美南浸信会
加里·鲍尔 (Gary Bauer) ^③ (前任主席) 托尼·帕金斯 (Tony Perkins)	家庭研究会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① 著名基督教领导人葛培理 (Billy Graham) 之子, 1973 年开始跟随世界展望会创始人鲍勃·皮尔斯 (Bob Pierce) 参与福音派组织的教授与发展事工, 1978 年成为小型基督教组织“撒马利安人的钱袋”的领导人。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 如今, “撒马利安人的钱袋”已成为世界巨型福音派教授组织, 在澳大利亚、德国、爱尔兰、荷兰、英国设有分支机构, 在世界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教授项目。2005 年, 该会用于教授项目的净开支为 240,529,786 美元。2005 *Financial Report of Samaritan's Purse*, p. 44. 该组织在苏丹及非洲展开了众多教授项目。

② 普林斯顿学士, 牛津博士, 1988 年开始服务于美南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 成为美南浸信会面对国会、政府和媒体的代言人, 2001 年起担任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成员, 2005 年 2 月, 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美 25 名最具影响力福音派领袖之一。有自己的广播节目, 曾出版多本书籍。在政治倡议中表现出鲜明的亲家庭立场。其简介可参 <http://www.richardlandlive.com/bio.asp> (March 1, 2007)。

③ 福音右翼领导人, 里根政府执政的 8 年, 他担任教育次长和里根的首席国内政策顾问, 政治观念为亲生命、亲家庭、亲成长。随后他担任位居华盛顿中心的家庭研究会 (网址为 <http://www.frc.org/>) 的主席和爱家第一副主席。在他的努力下, 短短 10 年, 家庭研究会从一个有 3 名成员, 年度预算为 100 万美元的小型福音派团体扩张为工作人员达 120 名, 年度预算为 1400 万美元的组织。1996 年, 他成立 Campaign for Working Families, 专事对生命、家庭等问题进行政治游说。2000 年他从家庭研究会辞职, 参加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 失利后成立 American Value, 继续他的政治倡议生涯。http://www.ouramericanvalues.org/bauer_main.php (March 1, 2007) 他从关注家庭价值到关注美国这一国家的价值, 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转变, 也一定程度体现出美国福音派右翼政治参与观的演变。

(续表)

姓名	组织
詹姆斯·多布森 (James Dobson) ^①	爱家 (Focus on the Family)
拉夫·里德 (Ralph E. Reed) ^② (前任主席) 罗伯塔·康布斯 (Roberta Combs)	基督教联盟 (The Christian Coalition), 世纪战略 (Century Strategies)
唐纳德·霍德尔 (Donald Hodel) ^③	基督教联盟、爱家
葛福临	撒马利亚人的钱袋 (Samaritan's Purse)
理查德·西兹克 (Richard Cizik) ^④	全国福音协会 (NAE)
汤姆·怀特 (Tom White) ^⑤	殉教者之声 (Voice of the Martyrs)
史蒂夫·辛德 (Steve Synder) ^⑥	国际基督徒关注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oncern)
贝弗利·拉哈叶 (Beverly LaHaye)	关注美国妇女 (Concerned Women for America)

1996年1月, 新任美国大使尚慕杰 (James Sasser) 在美国国务院与关注

① 爱家主席。爱家是一个集广播、植堂等诸多传教事工为一体的福音派组织, 网址为 <http://www.family.org/>。为了更好地进行政治参与, 他又成立了新组织 Focus on the Family Action, 以政治参与为宗旨, 网址为 <http://www.focusaction.org/>。

② 1961年出生, 自学生时代起就积极参与政治。1983年至1985年任 College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CRNC) 执行主任, 1984年成立学生组织 Student for America, 1989年至1997年任基督教联盟执行主任, 2001年起任佐治亚州共和党主席。

③ 哈佛毕业, 后获法学硕士。里根政府任内先后担任内政部次长、能源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此后先后担任过基督教联盟主席和爱家执行委员会成员。此外他还参与多个公司的建设和管理。http://www.sourcewatch.org/index.php?title=Donald_Paul_Hodel (March 1, 2007)。

④ 全国福音协会领导人, 各类政治倡议的积极行动者。曾著一文对全国福音协会的参与公共政策的历史进行详尽回顾。Richard A. Cizik, "History of the Public Policy Resolution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In Ronald J. Sider and Diane Knippers, eds., *Toward an Evangelical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Strategies for the Health of the Nation*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5), pp. 35—63.

⑤ 他由于向古巴走私基督教文学作品在古巴监狱度过了17个月。殉教者之声是一个由罗马尼亚牧师理查德·乌姆布兰德 (Richard Wurmbrand) 夫妇创建的传教组织。如今这一组织向约80个国家“受迫害”的教会提供“帮助”。这一组织的总部在俄克拉荷马的巴特里斯维尔, 在全世界30个地方设有办公室。发展迅速, 成员有10万人。网址: www.persecution.com/。

⑥ 国际基督徒关注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 是一个与许多国家的地下教会有联系的组织, 发布自己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网址: <http://www.icc-concern.org/>。

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人权外交

中国人权状况的组织对话时，对家庭教会（house church）一词一脸愕然。^①而如今，“中国家庭教会”一词在国会山和国务院早已成为大家熟悉的词汇。

2. 议题型结盟

尽管福音派持先知式的强烈道德立场，但随着几十年来政治经验的增长和政治技巧的丰富，福音派已经认识到了政治操作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复杂性绝不可用善恶两元论化约。今天的福音派已经不再像堂吉珂德那样孤军奋战，而是开始和不同的团体就不同的议题结成“统一战线”。

自1996年始，为了赢得《国际宗教自由法》（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ct）的通过，福音派与新教自由派、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等结成同盟。^②主流的犹太人组织，从美国希伯来联盟到反诽谤联盟，都积极支持此项立法。摩门教的世界家庭政策中心（World Family Policy Center）与福音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全国天主教主教大会、自由派的一些游说团体乃至一些在美国人数很少的教派，如藏传佛教团体、巴哈依教均成为福音派的盟友。这一份盟友名单会让20世纪50年代的福音派大惊失色。^③

在福音派认为苏丹的情势急转直下之际，一些保守的美国福音派教徒放下身段与黑人公理会合作。2000年后，他们开始联合一直忽视苏丹黑人处境的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黑人领袖克维西·穆福姆（Kweisi Mfume）^④，伊莱

① Paul Marshall & Lela Gilbert, *Their Blood Cries Out*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97), p. 75.

② 徐以骅《试析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一文对国际宗教自由法出台过程中福音派行动有全面的分析，本节不再对此问题进行赘述，而将把重点放在此后的有关人权诸法出台的综合评价中，徐以骅：《试析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载于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第515—546页。

③ “因为基督徒遍布世界数千个不同种族和文化群体，他们的受难为政权一般如何对待人权提供试金石。无论国别、地区、城镇，对基督徒的迫害是抑制其他诸如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工会成员，妇女、儿童和同性恋人权的先兆。”（Paul Marshall & Lela Gilbert, *Their Blood Cries Out*, p. 11.）从此可以看到福音派的逻辑是，对基督教人权的维护，就是对所有人权的维护，因此，人权主义者应该并肩为宗教人权而奋斗。

④ 民主党人，民权运动领袖，100届至104届国会众议院议员，1996年离开国会任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2006年竞选参议员失利。网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Kweisi_Mfume.

娜·霍尔姆斯·诺顿 (Eleanor Holmes Norton)^①, 沃特·丰乔依 (Walter Fauntroy)^② 和阿尔·夏普顿 (Al Sharpton)^③ 与福音派领导人联合起来, 进行群众动员和精英动员, 反对苏丹政权。

为了早日使禁止性贸易和人口贩卖立法, 福音派甚至与他们一直持强烈保留态度的女权团体, 如“此刻就平等” (Equality Now)^④ 合作。在立法活动的关键时刻, 国会议员收到了格罗莉亚·斯德勒姆 (Gloria Steinem)^⑤ 和其他著名女权领导人的来信, 查理斯·科尔森、理查德·兰德、理查德·西兹克和救世军的约翰·巴兹比等福音派领袖人物成功地游说了格罗莉亚·斯德勒姆和其他著名女权领导人, 促使她们致信国会议员支持立法。^⑥

3. 草根动员和造势

各基督教组织积极投入到宗教自由和人权议题的造势中去, 在美国、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宣传这方面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他们造势的主要手法是:

其一, 媒体攻势。福音派整合各类媒体的力量, 使国外问题国内化, 并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重点问题。福音派领导人和学者在各类平面和电子媒体上的专栏及访谈都反复提及国外的人权灾难和宗教迫害。由于众多福音派组织在所谓的受难地或迫害地有工作项目, 领导人往往也多次出入该地, 他们

① 民主党人, 1991 年至今担任哥伦比亚特区国会代表, 曾长期从事人权法律工作及人权倡议活动, 尤重女权。http://www.norton.house.gov/, http://en.wikipedia.org/wiki/Eleanor_Holmes_Norton (Jan 2, 2009)。

② 华盛顿特区伯特利浸会牧师, 华盛顿特区 100 年来第一位国会代表, 任期自 1971 年至 1991 年, 在美国国会黑人同盟中颇有影响。1972 年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 成为第一位赢得一场初选胜利的黑人。现任全国黑人领袖圆桌会议主席 (National Black Leadership Roundtable)。http://en.wikipedia.org/wiki/Walter_E_Fauntroy (Jan 3, 2009)。

③ 浸信会牧师, 人权倡议者, 广播脱口秀主持人, 1991 年建立全国行动网络 (National Action Network) 提倡公民为教育和贫困、支持小型社区事务等事务投票, 2004 年参加美国总统初选。http://www.aharptontalk.net/,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_Sharpton (Jan 3, 2009)。

④ 一个世界范围内通过社会、政治、经济途径推进妇女人权的国际人权组织, 网址为 http://www.equalitynow.org/。

⑤ 女权运动标志性人物之一。http://en.wikipedia.org/wiki/Gloria_Steinem (Jan 3, 2009)。

⑥ Allen D. Hertske, "Evangelicals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In Michael Cromartie, ed., *A Public Faith*, p. 227.

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人权外交

的切身经历往往更能增强他们评说的真实感。而福音派自己的各类内部媒体也大量刊发有关事件的现场报道和相关评论，并鼓励大家本着邻里之爱的精神关心伙伴信徒、关心人类的苦难。大量所谓反宗教迫害的书籍出版，使问题意识进一步深化。^① 相关电视专题片大量问世。其中颇有影响的是电视片“天使之触”（Touch by an Angel），这是一集聚焦苏丹奴隶贸易的电视片，展示了那片土地上因奴隶贸易而家破人亡、背井离乡者的景况，在美国颇有影响。^②

其二，基层教会动员。多个福音派组织开展为受迫害教会祈祷活动，催请普通信众参与拯救人权和受迫害教会的行动中去。“粉碎沉默”（Shatter the Silence）是为受迫害教会进行的每年一次的国际祈祷日活动。这一活动由专门组织为受迫害教会祈祷负责，它为全世界的宗教组织提供了有关宗教迫害的资讯，并建议开展促进团结的活动。在世界福音联盟的推动下，国际祈祷日活动始于1996年，当时有5,000个教会组织参与活动；到2001年，该活动声称已征募了30万个宗教组织，其中1/3在美国。在美国的国际祈祷日活动中，美南浸信会发挥了领导作用，它把资金分成小份调拨给下属全部分会，这些分会在全美有4万个。^③ 各宗派的基层教会也动员起来，游说所在的城市停止与侵犯人权、迫害基督徒的国家的商业往来，并写信给外国政府，要求他们释放因宗教原因而获罪的犯人。纽约牧师吉姆·盖斯特（Jim Geist）积极开展对苏丹问题的倡议，领导了一系列绝食罢工，催促纽约市对苏丹政

① 在所谓反宗教迫害方面有较大影响的书有：Nina Shea, *In the Lion's Den: A Shocking Account of Persecuted and Martyrdom of Christians Today and How We Should Respond*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s, 1997); Paul Marshall & Lela Gilbert, *Their Blood Cries Out*. 第二本书对海外“受围困”基督徒的处境进行了所谓的真实反映，在美国社会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议。第一作者是人权学者和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福音派圣公会信徒。现在他为自由之屋工作，负责起草该组织全球宗教自由状况的报告。他还编有 Paul Marshall, ed.,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World: A Global Report on Freedom and Persecution*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s, 2000)。同时，这几本书的作者是宗教自由倡议的亲密盟友。

② 《天使之触》的制片人参考了一些倡议团体。情节包括一位国会议员在其子催促下去苏丹目睹奴隶，他关注的原本是从苏丹进口阿拉伯香口胶业已形成的损失，而这次旅行改变了他。Allen D. Hertzke, “Evangelicals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In Michael Cromartie, ed., *A Public Faith*, p. 228.

③ Ibid, p. 221.

府采取制裁行动。^①

其三，学术审视。福音派联合众多人权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宗教和人权问题的会议，并出台多个详尽报告，通过这种途径来增强议题在全社会的信任度和他们所具备的处理此类问题的权威性。^②。目前福音派较为重要的思想库式组织主要有霍华德中心（Howard Center），比弗利·拉哈叶研究所（The Beverly LaHaye Institute）等。

4. 国会游说

福音派也投身到国会成员的精英游说之中去。福音派领袖通过自己和国会成员的个人联系、向国会发表组织声明等形式对他们形成压力，同时也敦促众多普通福音派信徒通过电话、邮件和电子邮件等多种形式和国会成员、州议会成员联系，促成强大的舆论攻势。^③

目前国会山的一些福音派议员本身就是倡议福音派进行国际政治参与的中坚分子，如众议员弗兰克·伍尔夫（Frank Wolf）、汤姆·坦可乐多（Tom Tancredo）、约瑟夫·匹兹（Joseph Pitts）和参议员山姆·布朗伯克（Sam Brownback）和比尔·弗里斯特（Bill Frist），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动近年来数个美国对外人权干涉的法律制定。

① 他还是基督徒人权信仰同盟（Interfaith Alliance for Christian Human Rights）在纽约的负责人。

② 自1994年起，举办了一系列有关此类问题的国际会议。详参徐以骅：《试析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载于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第522页注1。此外，2001年3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还以“中国的宗教迫害”为题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论坛。

③ 众多基层的福音派信徒在国会游说方面非常活跃。如丹佛教师芭芭拉·沃格尔（Barbara Vogel）任教的小学班级；一个大学学生数天来都勇敢地站在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奴隶围栏里忍受严寒的煎熬，直到他至少75%的同学与国会进行了联系。Holly Lebowitz, “A Resurrection of Campus Activism,” *Sojourners*, September-October 1999. <http://www.sojo.net/index.cfm?action=magazine.article&issue=soj9909&article=990910> (March 1, 2007).

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人权外交

表 2 致力于推动美国对外人权干涉法制定的近几届国会成员简表

姓名	党派	院属	代表州	宗教	重点推动法律
弗兰克·伍尔夫	共和党	众议院	弗吉尼亚	长老会	宗教自由法、苏丹、促进民主法案
汤姆·坦可乐多	共和党	众议院	科罗拉多	长老会	苏丹(苏丹阵营的领导人)
山姆·布朗伯克	共和党	参议院	堪萨斯	天主教	苏丹、人口贩卖及性贸易
比尔·弗里斯特	共和党	参议院	田纳西	长老会	宗教自由法、苏丹
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	共和党	参议院	北卡罗莱纳	浸会	苏丹
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	共和党	众议院	新泽西	天主教	苏丹
汤尼·霍尔(Tony Hall) ^①	民主党	众议院	俄亥俄	长老会	苏丹、反饥饿
山姆·吉德森(Sam Gejdenson)	民主党	众议院	康涅狄格	犹太教	人口贩卖及性贸易
保罗·威尔斯东(Paul Wellstone)	民主党	参议院	明尼苏达	犹太教	人口贩卖及性贸易
约瑟夫·匹兹(Joseph Pitts)	共和党	众议院	宾夕法尼亚	未指明宗派新教徒	宗教自由法
南西·派洛西(Nancy Pelosi)	民主党	众议院	加利福尼亚	天主教	宗教自由法
汤姆·迪莱(Tom DeLay)	共和党	众议院	得克萨斯	浸会	宗教自由法
迪克·阿米(Dick Armey)	共和党	众议院	得克萨斯	长老会	宗教自由法、人口贩卖及性贸易
理查德·路加(Richard Lugar)	共和党	参议院	印地安纳	卫理公会	宗教自由法
鲍勃·克勒门特(Bob Clement)	民主党	众议院	田纳西州	卫理公会	宗教自由法

① 宗教囚徒国会工作团(The Religious Prisoners Congressional Task Force),这一团体提供了一种机制,得以动用国会的力量,要求释放牧师或其他因实践其信仰而入狱者,特别关注的国家和地区有阿富汗、缅甸、中国、伊朗、朝鲜、巴基斯坦、苏丹、西藏、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西撒哈拉。国会网站有其专门网页: <http://www.house.gov/pitta/rpctf.htm>。

(续表)

姓名	党派	院属	代表州	宗教	重点推动法律
阿伦·斯佩克特 (Arlen Specter)	共和党	参议院	宾夕法尼亚	犹太教	宗教自由法
唐·尼古拉斯 (Don Nickles)	共和党	参议院	俄克拉荷马	天主教	宗教自由法
乔·利伯曼 (Joe Lieberman)	民主党	参议院	康涅狄格	犹太教	宗教自由法、促进民主法案
汤姆·兰托斯 (Tom Lantos)	民主党	众议院	加利福尼亚	犹太教	宗教自由法、促进民主法案
约翰·麦凯恩 (John McCain)	共和党	参议院	亚利桑那	圣公会	宗教自由法、促进民主法案

资料来源: <http://www.house.gov/>; http://www.adherents.com/adh_congress.html; Allen D. Hertzke, "Evangelicals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Michael Cromartie ed., in *A Public Faith: Evangelicals and Civic Engagement*, pp. 215—236; 徐以骅:《试析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第515—546页。

参议员比尔·弗里斯特 (Bill Frist) 原本是位医生,他在福音派组织“撒马利亚人的钱袋”的赞助下去过苏丹两次,提供医疗服务。因此他对苏丹问题有较多的美国式理解。汤尼·豪尔的重点议题则在国际饥饿问题上。当他知道众议院关于饥饿问题的特别委员会被废止时,他领导了一场广为直扬的饥饿罢工,目的在于让他的同事感到羞辱,促使他们更多地关注这一问题。^①

国会学者 (Congressional Fellows) 是一些议案的主要起草者,还在联络福音派与国会山其他成员之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在参议员布朗伯克办公室工作的沙龙·帕亚特 (Sharon Payt) 是海外人权的积极提倡者,主要致力于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宗教自由;在参议员理查德·卢格办公室工作的约翰·汉弗德 (John Hanford)、在众议员鲍勃·克勒门特办公室工作的劳拉·布赖恩特·汉弗德 (Laura Bryant Hanford) 和在众议员汤姆·迪莱的威

^① 对汤尼·豪尔20世纪90年代的人权政治活动,参看 Robert Booth Fowler, Allen D. Hertzke and Laura Olso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pp. 130—31.

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人权外交

廉·英博登 (William Inboden)^① 这三位议员助手都在尼古拉斯·利伯曼议案 (国际宗教自由法议案的前身之一) 的锤炼过程中出力甚多。^② 在游说过程中, 福音派内部左翼和右翼的分野仍然存在。但最终形成的合力仍在朝将观念外交机制化的方向发展。

三、福音派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人权导向

福音派力图将人权和宗教嵌入美国外交机制的努力自 1998 年以来已经初见成效。

1998 年 7 月,《国际宗教自由法》在参众两院全票通过; 2000 年, 国会通过了《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这一立法给予国际贸易者更严厉的处罚, 用新的工具装备执法机构, 以对付从事贸易的有组织犯罪辛迪加, 并规定处罚那些不能对性贸易判处刑罚和执行惩罚的国家; 2002 年,《苏丹和平法》(Sudan Peace Act) 得以通过; 2003 年, 国会通过了《北朝鲜人权法》(North Korea Human Rights Act); 2005 年, 在福音派教徒支持下, 以汤姆·兰托斯、约翰·麦凯恩和乔·利伯曼为首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些参议员共同提出并获得两院通过了《促进民主法》(Advance Democracy Act)。

“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发展相类似, 大多数福音派现在相信人权是福音的基本表达”。^③ 因此, 福音派积极推进美国的人权外交。福音左翼与福音右翼对人权问题的关注点并不一致。福音左翼的关注与自由派更为相似, 重点

^① 他出生于 1973 年, 先后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历史系, 专攻宗教与政治方向, 博士论文即 *The Soul of American Diplomacy*,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3, 曾在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办公室工作, 曾担任美国最大且最重要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西维塔斯学者。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3/10/AR2006031002003_2.html (April 23, 2008)。

^② Allen D. Hertzke, "Evangelicals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In Michael Cromartie, ed., *A Public Faith*, pp. 215-236; 徐以骅:《试析美国“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 载于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 第 530 页。

^③ Paul Marshall, "Human Rights," in Ronald J. Sider and Diane Knippers, eds., *Toward an Evangelical Public Policy*, p. 307.

放在人的生存权、发展权上，而福音右翼则对人的生存权、发展权与人的宗教自由权利均给予重视，尤为重视人的改宗权和皈依权。^①而大部分福音派的态度往往介于两翼之间，成为两翼争夺的对象。在战后的历史进程中，福音派对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度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见峥嵘。

然而，作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因素，宗教问题不可能单一发挥作用。在冷战期间，基督教是“美国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的重要立足点”及“在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性质和美国国民性的宗教基础之间”的划界工具。^②自冷战结束以来，作为后冷战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必过多顾及地缘政治因素。而此时，美国朝野重新发现基督教对推动全球民主自由的“贡献”，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所谓反宗教迫害运动便成为美国政府“推广民主”外交政策的工具。^③鼓吹所谓的宗教自由和人权成为美国霸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人权外交已正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而美国的国内舆论和国会的压力倾向是美国人权外交的主要动因。^④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一改国务卿任内对宗教问题的忽视，强调宗教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均举足轻重，呼吁美国外交决策层改变对宗教的冷漠态度，并在世界反恐和推进民主中重视宗教。^⑤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办公室首任主任汤姆斯·法尔（Thomas F. Farr）指出，应将推进宗教自由置于美国外交的中心，这不仅对海外的自由和稳定意义重大，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同样至为关键。^⑥众多西方政治家希望通过宗教自

① 这一点和福音派全球传教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直接关系。在一些传统信仰非基督教的地方，尤其是伊斯兰教的传统领地，改宗违反原有宗教的基本教义，因此基督徒发展空间甚小。改宗权如获全球性解决，将为基督教传教减少重要障碍。这是福音右翼如此重视改宗权的重要动因。

② [美] 罗伯特·鲍柯克、肯尼斯·汤普森编：《宗教与意识形态》（龚方震、陈耀廷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页。

③ Alle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for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Inc., 2004), pp. 26—27.

④ 周琪：《美国人权外交及有关争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第29—48页。

⑤ Madeleine Albright: *The Mighty and the Almighty: Reflections on America, God, and World Affair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6) .

⑥ Thomas F. Farr, "Diplomacy in an Age of Faith,"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8, pp. 110—124. Thomas F. Farr, *World of Faith and Freedom: Why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Liberty Is Vital to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08) .

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人权外交

由来打破第三波民主浪潮形成的僵局。

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宗教问题在美国朝野逐渐安全化。正如国际危机集团(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在报告中所总结:“将宗教自由作为安全问题,而不仅是人权问题,明确提倡只有在宗教自由获得保障、团体和个人行动不受压制的情况下,地区安全才可确保。”^①小布什总统有着深厚的福音派选民基础,在国外推进人权和宗教自由是其巩固和扩大选民基础的“全赢议题”。^②2001年曾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一职的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就是新里根主义的代表人物。^③而《1998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草案的重要撰写人之一威廉·英博登随后进入美国国务院,在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担任特别顾问,自2005年4月4日起,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署,2006年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④福音派的主流意识形态因素与现实主义外交的理念第一次如此紧密地协调在一起。

尽管福音派将其宗教和人权思想机制化的努力初见成效,然而,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被导向完全的理想主义,现实外交的考量使得福音派的旨趣并不能完全兑现。政治总是各方力量均衡和妥协的产物。

四、福音派与美国对华宗教及人权外交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成为硕果仅存的共产党大国,美国亦视中国为“推广民主”的主要对象。从宗教问题入手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成为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n its Report of 1 March 2001. *Does Human Rights Need God?* p. 272.

② 在2000年大选中,布什获得的福音派选票占其选票总数的40%左右。Elisabeth Bumiller, “Evangelical Sway White House on Human Rights Issues Abroad,”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03) <http://query.nytimes.com/gst/fullpage>.

③ 犹太人,曾担任里根政府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从委员会离任后,他一直在布什政府任职。2006年2月2日,他受任为总统副助理和全球民主战略方面的国家安全顾问助理。<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02/20050202-10.html> (Jan 6, 2007) .

④ <http://www.state.gov/s/p/44178.htm> (April 23, 2008); News. The NSC's Sesame Street Generation.

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以人权为手段对中国施压服从于美国制约中国的大战略。

“9·11”事件之后，美国社会日趋保守，宗教右翼和各种反华势力合流，一直在中国的宗教问题上大做文章，并且这种趋势还将延续下去。近年来，推动中国的宗教自由成为对华人权外交的新重点，宗教自由问题在中美人权摩擦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已构成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曾经是基督教最大的工场，1949年以前，历史上来华的传教士人数及基督教各宗派投入这一工场的资金均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拥有世界最多未得之民的中国重新成为传教重点区域。尽管目前中国不允许海外传教人员直接入境传教，福音派通过救援和发展、通过地下传教及支持，与中国官方和民间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一些宗教人权的提倡者将中国宗教和社会的图景所作的描绘基本从西方中心主义、基督教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对整个中国宗教和社会现状的了解非常片面，错漏比比皆是。^①

目前福音派在涉华宗教和人权问题上最为关心的有以下几大方面：

1. 中国的法治和宗教管理问题。福音派认为中国的法制建设还没有达到国际标准，中国的法治文化环境尚待发育，这都影响到中国的宗教自由。

2. 地下教会。福音派以美国标准来看待中国的宗教问题，认为中国政府依法对地下教会的管理是侵犯了教会信徒的宗教自由。

3. 西藏、新疆问题。福音派在宗教自由问题上与藏传佛教团体结成了松散的同盟，他们认为西藏和新疆的宗教自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们甚至低估“藏独”、“东突”分子对国内和国际安全的莫大威胁，无端指责中国是借反恐之名约束两地的宗教自由。

4. 邪教问题。福音派对中国以“法轮功”为代表的邪教组织甚为关注，与美国国会对其态度同出一辙，他们认为“法轮功”、“中功”均属于新兴宗

^① 翻开此类书籍的中国部分，随处可以找到各类偏执和错误。如一书在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消除“外国影响”时，就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存在1300年，800年前中国即有天主教的主教。而只字不提聂斯脱利和也力可温教在中国早已失传，近代基督教确实是伴殖民主义而来、在中国大地享尽特权的外国洋教，更不提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罪恶。可参见 Paul Marshall & Lela Gilbert, *Their Blood Cries Out*, pp. 75—84.

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人权外交

教“精神运动”的范畴，信徒有实践其信仰的自由。但他们无视法轮功对公共安全的危害，将中国对这一邪教组织的取缔当作中国侵犯公民宗教自由和人权的重要“罪证”。

5. 朝鲜“难民”问题。福音派一直十分关注朝鲜在华“难民”问题，认为中国遣返朝鲜“难民”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①。他们向国会施压，最终导致了《北朝鲜人权法》通过。他们也要求中国接纳而不是遣返这些“难民”。

矛盾如何解决？美国福音派中已形成两类截然不同的路径。

众多福音派认为中国的基督徒正受到迫害。家庭研究会便诬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侵犯宗教徒的国家”，其前会长加里·鲍尔（Gary Bauer）1997年7月在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就危言耸听地指责中国“迫害”5000万基督徒，以此反对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②

而一些对中国的现状及历史和文化有更深了解的福音派的立场则温和得多。葛培理幼子葛内顺（Nelson Bell）一直为中美之间的宗教交流开辟道路，也多次就中国的宗教现状在美国各界发表自己的切身体会。2000年3月23日，他就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地位在参议院作证，对此持支持态度。他说明了东门国际当时已在中国合法派发了250万本圣经，也出版发行了其他一些宗教文献，同时，《葛培理讲章集》（中文版）也经许可在中国派发；并说明当时已有数百个西方传教组织在中国公开合法地活动，从事教育、培训、医疗、人道主义援助、农畜业扶助等方面的活动；他也说明了中国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进步。他提出，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地位，一可以在贸易体系的基础上，促进中国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遵从；二可在发展国内法治的基础上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三可以扩展中国人的个人自由。因

^① 该公约第三条规定：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逐、遣返或引渡至该国。参见胡志强编：《中国国际人权公约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34页。

^② <http://www.slate.com/id/3648/entry/23890> (March 1, 2007) .

此，这对美国的贸易和宗教组织均有益处。^①

倡议国际 (Advocates International) 也支持这一路径。山姆·艾力克森 (Sam Ericasson) 是基督徒法律协会 (Christian Legal Society) 的前领导人，他创立和领导了倡议国际，这一组织并不揭露或批评外国政府的问题，而是精心发展与海外领导人的关系，以此方式帮助建立法律基础设施，保护宗教自由。艾力克森与中国宗教管理部门的领导人有着良好的个人联系，并曾在中国 1997 年的《宗教事务解释条例》出台前就其草案提出过自己的意见。

随着福音派海外经验的丰富和政治技巧的提高，尽管第一种路径依然在美国福音派中很有市场，但第二种路径已经逐渐开始获得了更多的认同。

美国福音派及其他宗教右翼在国外宗教自由问题上的主要决策是通过国会将宗教和人权外交纳入法制化轨道。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产生就是宗教右翼推动国会立法的阶段性成果，它的根深植于美国宗教右翼的沃壤中，代表着它们的立场和观点。因此，该委员会的矛头也对准了宗教右翼认定的“严重迫害宗教”的中国。自成立以来，经过数年的运转，该委员会尽管对华基调未改，但随着对中国了解的增进，以及之前强硬建言的实施效果令人沮丧，近年来委员会对华政策建言的态度也有了一定的转变。2005 年，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应用商业手段“向其行为和商业活动促进和保护国际人权标准、包括宗教或信仰自由的美国公司提供新的激励”。^②建言美国政府加强技术援助项目的国际合作，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促进“中国遵从其国际人权诺言和针对中国的双边或多边人权提案。”^③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现有的条件下，福音派对中国宗教和人权问题的基本态度难有实质性的改变。双方对宗教自由的理解大异其趣，对中国宗教现状的观点截然不同。然而，无视中国宗教传统，静止、孤立而片面地看待中国宗教问题，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这样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劫后重生的民族自尊心的国家指手画脚，这并不是明智的做法。正如美国

^① Testimony of Nelson E. Graham,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March 23, 2000. Resource downloaded from <http://www.eastgates.org/papers.html>.

^② 2000 IRFC Annual Report; 60. Resource downloaded from <http://www.uscirf.gov>.

^③ 2005IRFC Report, *Policy Focus on China*; 21. Resource downloaded from <http://www.uscirf.gov>.

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人权外交

的中国问题学者李可柔 (Carol Lee Hamrin) 指出的那样, 在人权和宗教自由领域“把美国政府当作喊话筒的努力把美中对话变成一场唇枪舌剑, 除了助长中国人关于美国与之为敌的思维定势之外, 对中国并无影响”。^①

“基于现实主义的对两国共同利益的认识, 美国会把同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冲突限制在不损害其重大国家利益的范围内。”^② 福音派对美国政府的对华人权外交的影响目前也限制在这一范围之内。

五、结 语

近几十年以来, 美国老派教会的信徒人群在不断减少, 影响也在减弱。随着自身的成长, 福音派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一直在抬升。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民众的普遍立场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这成为福音派政治嵌入的前提。而大多数福音派往往以美国为标准, 对国外的政治、社会事务进行批评。

尽管“白人福音派信徒近年来活力十足, 经常支持允诺小政府和更为保守的堕胎和同性恋政策的政治候选人, 但福音派在宗教信仰上和政治上都是分散的”。^③ 以至于站在福音左翼立场的罗纳德·西德 (Ronald J. Sider) 切盼分散的福音派能够共同拥有一些政治参与的基本原则。^④ 总的来说, 在进行政治参与的过程中, 福音“右翼把人性与世界未来的悲观主义和美国是上帝所拣选的国度与作为政治准则的美国宪法的坚信结合在一起。左翼则以更凸显基要主义特色的标准攻击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不公平”。^⑤

① 转引自徐以骅:《试析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第546页。

② 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3页。

③ Robert Wuthnow, “Can Religion Revitalize Civil Society,” in Corwin Smidt, ed., *Religion as Social Capital: Producing the Common Good* (Waco: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08.

④ Ronald J. Sider, “Justice, Human Rights, and Government: Toward an Evangelical Perspective,” in Ronald J. Sider and Dianne Knippers, eds., *Toward an Evangelical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Strategies for the Health of the Nation*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5), p. 192.

⑤ Harriet A. Harris,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Religious Resurgence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A Look at Protestant Evangelicalism,” in K.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0), p. 30.

福音派力求将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嵌入到国家机制中，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国家公共政策。自 20 世纪 60 年代福音派的海外传教及救援事工使他们网络不断扩展，在冷战结束后更是得以渗入世界每一个角落，而对伙伴信徒的“苦难”或人权受到“侵犯”的人群的关注成为他们卷入外交事务的动力，他们由此开始追求将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嵌入国家机制之中。^①

福音派为了替传教开路、将基督教价值政治化，极力将自己的思想和意旨嵌入到美国政府的决策中去。冷战期间福音派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多走政府路线，通过与政府首脑的亲密关系来影响政府决策，这一点在葛培理身上表现得尤为充分。自帝王式总统尼克松下台，美国国会的权力开始扩展。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福音派正在试图将福音思想通过国会立法得以机制化。

新一代福音派领袖与前辈有所不同的是，众多精英阶层出身的人成为福音派领袖人物，如尼克松总统的白宫第一助手理查德·科尔森、国会议员之子帕特·罗伯逊，而且一些从政府部门卸任的前官员也成为福音派组织的领袖人物，如里根政府的高官加里·鲍尔和唐纳德·霍德尔等。这使福音派在政治参与方面展现出新特点。由于他们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更善于政治运作，因此也更希望将自己的政治努力机制化。由此，生机勃勃的福音派网络近年来政治倾向日趋强烈，并以将福音派的政治意图机制化为首要目标。通过国会游说，福音派和其他团体结盟，迫使国会通过立法，确定外交政策的策略以及制裁他国的行为准则。“久而久之，这种做法驱使美国外交政策走向单边主义和以强凌弱。”^②

福音派的网络影响政府，美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过程对福音派的政治参与也产生影响。为了适应美国的政治运作网络，福音派也逐渐改变政治参与的作风，以议题为主导，和各类不同的政治倡议者结盟。

① 具有道德伦理向度的外交政策一直在美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美国人民对赤裸而彻底的现实主义尤其觉得不舒服。亨利·基辛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随后的国务卿任期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外交政策总是招致批评。” See James Lindsay, “Morality is Really Hard,” in J. Bryan Hehir, eds., *Liberty and Power: A Dialogue on Relig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an Unjust World*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p. 102.

② [美] 约瑟夫·奈著，约瑟夫·奈、门洪华编：《硬权力与软实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0 页。

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人权外交

福音派推崇的宗教价值观与国家利益并非总是一致。对待朝鲜问题，有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应该缓和同朝鲜的关系以解决核问题，不必太拘泥于人权问题。政府往往会考虑到国家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对一些“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并不愿意实施经济制裁。美国政府对待沙特的态度就是显例。

在谈到现实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时，大部分中国学者都认为，“主义可以影响政策，但决定政策的思想因素是多元的、综合的，不能说某个政策是某一种主义的应用”。^①而福音派信仰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是如此。因此，尽管福音派的政治参与在不断发展，但由于它只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多种思想和力量之一，在实效方面显示出局限性。

^① 任晓、沈丁立：《“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学术讨论会综述》，载于沈丁立、任晓主编：《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03页。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a violent competition concerning tariff policy occur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mong two region-based political coalitions, for trade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respectively. This debate had created a pendulum's movement in the *early tariff policy* of the U.S. After the civil war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U.S., adverse to the then "global trend", migrated into a new era of trade protectionism, which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U.S. The forming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U.S. tariff protection policy was the result of the victory of the coalition for trade protection in the Congress. And the ultimate reason lied in the fact that a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in the U.S. had pushed economic factors from agriculture in preference for free trade to manufacturing sectors that supported trade protection. It was this fact that had

Going toward Trade Protectionism: Societal Coalition and US Tariff Policy in the 19th Century *Li Wei* (159)

In later 1960s and early 1970s, the U.S. China policy underwent persistent adjustments, among which the relaxation of its economic embargo against China (popularly known as "China embargo") was a significant one. This policy adjustment was largely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hre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with the first one playing an ultimate role: to play the China Card and to construct a U.S.-China-Soviet triangle; to express goodwill and to alleviate Sino-U.S. relations; and to reap commercial profits. Therefore,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initiated a series of relaxation measures in a certain period from Nixon's inauguration to his first trip to China. Correspondently, the Chinese side experienced a remarkable shift from "no big issues, no trivial issues" principle to a more accommodating approach so a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breakthroughs in this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erms of policy effectiveness and operational impact, this policy adjustment played a nevertheless positive role in moderating the hostile relat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maintaining their bilateral contacts and building mutual trust.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Relaxation Process of U.S. "China Embargo" in the Early Phase of Nixon Administration *He Ping* (136)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evangelicals have been increasing rapidly both in America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Catalyzed by the zeal passion to evangelize the world and depending on their flourishing and effective work on mission, relief and development on the earth, American evangelicals have a whip hand among world evangelicals.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we can not understand the US foreign policy without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is new force in the society. Actually with the dramatic expans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movement and the rapid rise of international faith-based NGOs, American evangelicals began to assert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US foreign policies by promoting their ideas on world affairs as well as by nurturing and mobilizing a wide-spread transnational network of fellow believers.

Contemporary American Evangelicals and the Human Rights Diplomacy in the U.S *Tu Yichao* (113)

CONTRIBUTORS

NI Shixiong, Professor with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Wu Xinbo, Professor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Vice Dean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Wu Lei, Professor with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Yunnan University.

Liu Xuejun, Doctoral Candidate with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Yunnan University.

Zhang Guang, Professor with th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Diao Daming, Doctoral Candidate of the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Yu Weiyun, Undergraduate Student of the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Pan Yaling, Assistant Professor with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Tu Yichao, Assistant Professor with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He Ping, Assistant Professor with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Li Wei, Doctoral Candidate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Jia Min, Doctoral Candidate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